

目 录

刘立平同志战斗的一生·····	杨宗素
记刘立平同志二三事·····	赵乐群
贺昌群先生事略·····	贺龄华
我所经历的三个不同时代·····	宁芷邨
忆四婶安妮·玛丽·····	杨大和
乐山红十字会医院历程·····	余跃渊
乐山历代科技人物简介·····	王恭铭
国民党雷马屏峨沐守备部队起义前后·····	赵天恩
宋希濂被俘见闻记·····	吴有清
丹棱解放前夕社会动态·····	吴家瑞
冯玉祥来乐山发动献金救国运动实录·····	徐雨深
我在犍为泉水乡交枪经过·····	严勋全
仁寿田赋制度的演变及弊端·····	徐忠稷
雷马屏边区垦社种烟与93师铲烟纪实·····	叶 星
禁烟轶闻·····	罗朝维
马边彝族的婚姻和家庭·····	杨家培
峨边彝族社会风情一瞥·····	李 樵
朱德、陈毅、贺龙同志在峨眉山·····	张承业
南安吟·····	戴 廉
海外赤子心 思乡思国情·····	戴丽宿
有关明代“嘉定四谏”的一件文物——徐公墓志铭·····	唐长寿
嘉阳拾石记·····	章 胎

刘立平同志战斗的一生

杨宗素

一、和立平同志相处的日子

一九四二年，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，我在乐山女子初级中学读书。因乐山被日机轰炸，学校迁到苏稽乡下，破烂的祠堂是我们的教室，简易的茅屋是我们的宿舍。现实生活告诉我们，祖国正在被践踏、被蹂躏，人民正在遭灾难、受煎熬。教师中的爱国青年，通过音乐、戏剧、文学积极宣传抗日思想，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；课余时间，踊跃参加歌咏、话剧、讲演、墙报等活动。在同学中，冀惠秋与我最好，我们常在一起参加这些活动。

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日，惠秋告诉我，她在乐山电报局工作的二姐要来看她，同来的还有二姐的同事刘安洲（立平）。吃过早饭，我们就到学校门外去等。大约九点钟左右，他们来了，惠秋给我介绍了她的二姐，对于立平，她不知怎么称呼才好。立平笑着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刘安洲，我妹妹叫我四哥，你们也叫我四哥好了。”

我们在学校走了一圈，就步行到离苏稽十华里的水口场去看立平的妹妹刘美华。她当时也在为了避空袭从城里迁下乡来的乐山师范读书。一路上，立平讲话最多。他说从学校墙报上看到了我写的新诗《暴风雨之夜》，赞扬我写出了暴风雨之夜给弱小的孩子们带来的恐怖、危险及孩子们盼望黎明、日出的心情。同时指出：暴风雨过后，必然是明朗的晴天，要勇敢地迎接暴风雨，并介绍了高尔基的《海燕》。当我们谈到学校中有的同学，整天

就讲打扮，比谁家里阔气，使人厌烦时，他要我们注意团结同学，影响他们；指出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只有团结起更多的人，才能有所作为；又说那些同学也还是纯洁的少女，是可以接受新思想的。他的谈话，使我们感觉新鲜、有理。他留给我们一些进步的文艺书刊。

从此，我们经常利用星期日去城里电报局找他。当时虽然已有公路，但尚无公共汽车，从苏稽到城里，要走三十华里的山间小路。有时星期六进城，星期日回校；有时星期日打早进城，下午又忙着赶回学校，尽管累得不得了，但心情却很愉快。我们得到了在学校学不到的知识。暑假中，我们更经常地去找他，他给我们谈论小说、朗诵诗歌，并开始向我们介绍社会科学书，如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，薛暮桥的《政治经济学》等。看不懂的地方，他就给我们讲解。他不仅是和蔼的兄长，也是可敬的老师，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。

一九四二年冬，立平突然不知去向，我们都很焦虑；直到一九四三年秋，才从珮秋二姐那里知道他已被捕，关押在重庆。一九四五年春节，立平被释放回到乐山。两年的监狱生活，使他显得苍老了，又黑又瘦，但精神依然如故，没有一点消极颓废的言谈。他说他虽然已获得自由，但敌人是不会放松他的，乐山不能久留。春节过后，我们刚开学（我这时在省立乐山中学读高中），他又只身一人，踏上了去西昌的旅程。到西昌后，在《新康报》工作。过去听立平讲过他只是小学毕业生，怎么能担任报社编辑呢？这要感谢国民党的“监狱大学”，使他摆脱了工作和生活的奔忙，有空闲的时间读书。他被关押在重庆五云山“战时青年训导团”，那里关押的大部分是入党不久的青年或“共产党嫌疑犯”。敌人妄图以“训导”来改变这些人的思想，除了讲课贩卖国民党“十个主义、一个党、一个领袖”的货色外，在图书馆里，也有一些历史、古典文学、现代小说。立平除了阅读一些秘密传阅的

革命书刊外，就利用上课和自习时间，阅读从图书馆里借的文学古籍，练习写作，以寄托革命感情，同时提高文化水平。关押期间，他写了厚厚一本诗集。（他的同狱难友也是如此，出狱后不少人在文化界工作，如杨一纯在广西日报；帅左尧在重庆日报；金笙在四川日报编文艺版；赵岚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）。这些都为他在出狱后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打下了基础。

在西昌，他除了给我写信鼓励我积极向上外，还经常寄给我一些党的书刊，如《整风文献》《联合政府》《联共党史》等，这些书都是除去封面，拆散了夹在文艺书中寄来的。在立平的影响鼓舞下，我参加了进步同学杨彦通、魏世荫等人组织的读书会《银河社》。我们一方面秘密阅读革命书籍，讨论时事政局；另一方面公开出墙报，组织同学阅读、讨论进步文艺书刊，如《母亲》《铁流》《死魂灵》和肖军的《八月的乡村》、艾青的《火把》等。乐山三青团干事长李至刚到省乐中来当校长，强迫学生参加三青团，我们串连一部分同学进行了抵制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经历艰苦斗争的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。这年年底，立平在西昌，遇到一个在成都时的同志。由于组织遭到破坏后彼此多年没有联系，不了解对方的情况，不敢接触，便匆匆离开西昌，回到乐山。这时尽管内战的序幕已拉开，但毕竟抗日战争已结束，解放区日益扩大，我们的心情是舒畅的。这个春节，我们过得很愉快。年青的朋友们每天在立平家团聚，评论时局，唱革命歌曲，扭秧歌。立平不善于引吭高歌，但他喜欢听我们唱，有时也哼着低沉浑厚的调子伴着我们欢乐的歌舞。过完旧历年，我们开学了。立平又扛着简单的行李，走上艰苦的旅程。到了重庆，在商务日报朋友处住了几个月，由地下党领导的“职青社”介绍到万县找熊道光同志安排工作。熊介绍他到川东日报。搞了几个月，因触犯了当地的反动党团和地头蛇，又呆不下去了。

一九四六年冬天，熊道光同志又介绍他到离万县八十多里的鱼泉中学教书。鱼泉中学是由共产党支持，民主人士杨吉甫先生创办的。学校建在崇山峻岭中；招生对象是贫苦农民子女；教师多系不计报酬志愿来此服务的地下党员与进步青年。以“民族的、科学的、人民大众的新教育”为指导方针。在教学内容上，除科学文化知识外，还结合形势进行思想教育，文史课不用国民党的统编教材，而自选资料。如语文课主要选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何其芳等革命作家的文章和进步报刊上的政论文，也选一些优秀的古代诗文。历史课联系实际进行历史唯物主义、社会发展史的教育。在课外，还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籍，组织学生讨论重大的时事问题，开展革命文艺活动。此外，还带领学生适当参加搬柴、挑水等劳动，既节约学校开支，减轻家庭负担，又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。立平在学校除担任一个班的语文课和班主任外，还兼任学校总务主任，学生思想生活辅导，课余常给学生讲故事、理发。

我在乐山高中毕业后教了一年小学，于一九四七年秋到万县与立平结了婚。组织上安排我在太禄小学教书。这所学校的性质与鱼泉中学一样，也是杨吉甫先生创办的。两所学校相隔二、三里，教师有的交叉兼课，有时联合举办文娱晚会。

由于个别同志不慎，在介绍来学校的教师中，混进了一个叫宋达仁的反动分子。他从立平的往来信件中，有所察觉，认为刘是“危险分子”，对他进行监视。为此，组织上不得不让立平又一次转移。我们于一九四八年冬转重庆。到重庆后，组织派立平去长宁县安宁桥培风中学参加那里开辟据点的工作。他的身分是教导主任兼语文教师。我则在重庆省教院住了半年才去。在那里，诞生了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小鱼。培风中学也有许多革命同志，但不象鱼泉那样是革命者直接创办的，人事关系也要复杂得多。这年，全国形势起了很大变化，经过三大战役，解放战争的胜利已

成定局。为了迎接家乡的解放，我们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底回到乐山。

回乐山后，我在离城约七十华里的许家乡小学教书，立平由组织介绍到凌云中学工作。他在学校通过冀玠秋、黄子诚等进步学生组织读书会，联系广大青年，传播革命思想；同时与惊川鞋店的曹致君联系（曹于一九四五年接受了地下党同志的影响，一直坚持为党工作），并通过曹的关系，在乐山、犍为的石林、许家、踏水、蔡金等乡活动，搞社会调查，发动矿工与农民，并让一些人打入自卫队，掌握地方武装，准备迎接解放。一九四九年十月八日，立平兴致勃勃地来到许家乡小学，告诉我说，毛主席已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，解放军很快就会南下，家乡的解放指日可待。他这次下来，就是为了把这个消息带给同志们，让大家积极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。事后，我听说他在石林要连映长、杜品金等人迅速控制着地方武装；要踏水的江维礼搞部油印机印刷宣传资料；要天池坝的冀尔让同志把乐山城区的进步同学组织起来。他还告诉我，组织上马上要派陈宗瑜同志到乐山来，他让我安排陈宗瑜同志到许家乡小学，以教师身分作掩护，组织这一带群众迎接解放。十月九日早饭后，他离开许家乡往蔡金乡方向去了，谁知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。

我与立平从相识到永别虽经历了八个年头，但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却不过一年，他也不爱谈自己的事情。直到“文革”以后，为了弄清他的历史，通过组织的调查和我自己的访问，才进一步了解了一些情况。

二、对光明的执着追求

从立平遗留下来的自传（从出生到入党）中，看出他于一九一五年二月十九日（农历一月初六）出生在乐山的一个贫民家庭。读了四年私塾。九岁开始，就挎着篮子，沿街叫卖纸烟、瓜子、花

生、糖果等。十四岁（1929年）时到太平寺镇上的小学上高小。一九三一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学校老师组织了国难宣传团，向赶集的人宣传救亡的道理，立平被选为宣传员，经常上街演讲。这一年，县教育局举行全县小学会考，立平获得第一名。第二年，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初中，但因家庭贫穷，不能供他上学，从此失去求学的机会。家乡的人都为他惋惜，对他表示同情。当地一士绅王述怀，系同盟会员，曾任四川陆军八师参谋长，想帮助他，找他去，叫他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“君子忧道不忧贫”。他的理解是：学问是很难求得的，一个人应当忧虑的不是贫穷而是没有学问。这句话，对他的人生观起了极大的作用。以后在社会实践中，又有进一步体会，认为：“道”除了一般的学问外，应该还有一种特殊的含义，是“救世济人”的真理。认为人应该找寻这样的“道”，追求这样的真理，要为之而献身。他决心要使这“道”“永远照着我的灵魂，为了它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。他实践了他的誓言。不仅一生刻苦学习，更为共产主义这个“道”献出了生命。

王述怀介绍他到乐山电报局任报务员。按规定，这个职务要有高中毕业资格才能报考。他以一个小学生的程度，自然是很吃力的。进电报局后，为了胜任工作，他自学英文，强记拼音地名，还坚持练大小字。以后业务比较熟悉了，更把业余时间，尽量用在读书上。他不仅阅读古文、诗词，也阅读现代的诗和小说，长期订阅华西日报，还先后订阅过进步的生活周刊、新生周刊。后来，这些书刊都被迫停止发行，他又利用业余时间和待业时间跑书店，翻阅书刊。面对五花八门的书刊，没有良师指引，全靠自己去比较、鉴别。他以是否宣传鼓励人们坚持抗日为标准，选择了可以接受的书刊。一九三七年在成都电报局工作时，他发现《皇芒周刊》的内容比较好，便长期订阅。这时，他被抗日激情鼓舞，不再满足于读书，而想参加抗日救国的实际活动。

他从《星芒周刊》上发现征求社员的启事，很想应征，但规定要有两个社员介绍，他却一个都不认识。爱国救亡的热情鼓舞着他，独自跑到星芒社去自我介绍，述说自己的追求与愿望。正巧碰上了该社的负责人蒋慕岳（后改名为江牧岳，解放后任《中国日报》社长，一九八四年为刘立平写了介绍其入党的证明），他为立平的热忱感动，介绍立平参加了星芒社。原来星芒社是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，开展阅读、歌咏、戏剧、讲演、出版刊物等救亡活动。根据他的爱好与性格，组织上分配他管理图书。这项工作使他有机会读了许多外面买不到的书籍，明白了许多年来他探索而始终没有弄明白的问题，如人间为什么不公平，社会上为什么有许多不合理的事，国民党为什么不愿抗日，真正抗日的力量是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等等。随着认识的提高，他愈来愈迫切渴望找到党的组织，直接参加革命工作。当时有许多进步青年奔向延安，他也很想去，但家有老母幼妹，需要供养，而且也筹不够路费，他心里非常苦闷。蒋慕岳了解到他的思想，找他谈心，指出革命不一定都要到延安去，到处都有工作。经过一年多的考察，终于在一九三八年秋的一个夜晚，介绍立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立平在自传第一部的结束语中写道：“我从此终结了个人摸索的时光，而以后的道路将无比开朗，填补起太早失学的缺洞，生活也更过得光辉而有意义。”

立平入党以后，先后与赵子博、赖祖黄等同志同过组织生活。他积极在电报局开展活动，利用报差关系，分送、张贴宣传资料，并介绍了几个同志加入“星芒社”。

道路是曲折的，在革命与反革命力量对比尚未发生根本转变时，更是如此。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，形势恶化，地下党组织执行“隐蔽精干”的方针，刘立平被通知疏散回乐山隐蔽。一九四二年，党组织被破坏，关系断绝，他心急如焚，离开党组织，意味着又将陷入个人摸索的迷途，他是难于忍受的。一九四二年

冬，他冒着危险去成都找党，不幸被捕。入狱后，他仍设法寻找党组织，但一直未发现。出狱后，他主动去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汇报自己在集中营里的情况，又通过各种途径，向党提出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及分配工作。由于对他在狱中的情况不够了解，需要审查，未恢复组织关系，后来经过考察，经重庆地下党沙磁特支书记刘国志（解放前夕在中美合作所牺牲）同意，由洪宝书同志以工作关系联系。只要有组织指引，能够为党工作，他就满足了。从此，他自觉地接受党的指示，主动向党汇报，按党员的条件严格要求自己，直至为党献出生命。

三、重庆集中营里的斗争

抗日战争中期（一九四二年），国民党反动派对外秘密妥协投降，对内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，打击进步活动，摧残各地坚持抗战的力量，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。就在这年冬天，立平在成都被捕，关在特委会秘密监狱中。一九四三年元月，他被押送到重庆五云山“战时青年训导团”。根据同时被捕并关在一起的杨一纯、刘岚山、金奎等同志的回忆，开始入狱时他沉默不语，经过观察分析，认清敌友后，他热情地与同志谈心，揭露特委会主持人杨应持的叛徒面目。他向杨一纯说：“杨应持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，是革命队伍里的渣滓，这种出卖灵魂的人，比之于出卖肉体的妓女不知卑鄙可耻多少倍。他们干了丧失天良的坏事，总有一天要受到清算的。”有一个青年被特务严刑拷问，搞得神志不清，高呼贺龙、肖克的名字，吓得敌人胆颤心惊，立平对他非常赞扬。狱中同志从未见过立平愁眉苦脸，他常低声哼着高尔基的《囚徒歌》：“监狱永远是黑暗……”

集中营当局，常假惺惺地说他们被捕青年是纯洁的，只是受了共产党的宣传，思想上才有病，现在让他们到训导团来，是为了给他们治病。他们的训导全是贩卖一个主义、一个党、一个领袖

的货色，对逃走后又被抓回的人，打得遍体鳞伤，动辄关禁闭。立平用事实揭发敌人的伪善与欺骗，鼓励青年同敌人斗争，研究应付敌人的办法，大家抱成一团，不向敌人提供不利于难友的情报。通过秘密渠道，在狱中传阅党的《新华日报》《群众周刊》和进步杂志《世界知识》《文艺阵地》，又与同志们讨论学习的心得体会。如读了《新华日报》登载的郭沫若写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，立平向同志们介绍说，这篇文章写得好，要他们仔细读一读。他坚信党的正确领导，一定可以避免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失败和错误。他常以字写得不好和不会写文章为借口，拒绝特务布置的办墙报的任务；以破坏锄头抵制劳动；以拒绝医治伤口，拖长不参加军事训练的时间。一次，集中营搞“洗心革面”运动，将写好的《脱党宣言》在会上念后，要大家举手同意，立平是不举手的人之一。由于他的不“驯服”，被延长了半年受训期。

四、万县办报

一九八五年九月底，鱼泉中学邀请我去万县参加建校四十周年庆祝大会。在那里，我见到了许多老同志。其中有两个人是当时与立平一道办报的，一个是冯秋（现为达县师专党委书记），一个是陈德明（现任成都水印工艺厂会计），他们告诉我，一九四七年秋立平到万县，由熊道光介绍他们相识了。当时万县有个《川东日报》原是国民党控制的反动报刊，全部采用“中央社”消息，推行国内反共、国外亲美反苏方针。当时官方无钱，报又办得不好，每天只能发行几百份，难以维持下去。因陈德明有个印刷厂，官方让陈担任社长，使报能办下去。陈德明是个比较开明的人士，与杨吉甫、熊道光的关系较好，熊就利用这个关系介绍冯秋、向荣冕、李明、徐尧琴、万宝仁、刘明诚（刘立平当时的名字）等地下党员及进步同志到报社工作。他们去后，研究要改变报纸面貌。立平在西昌《新康报》工作过，提出多采用联合

新闻社的消息，变反苏亲美的方针为亲苏反美。立平与万宝仁任编辑，冯秋、向荣冕等当地同志在外采访。他们从国民党报刊上选出揭露社会黑暗面的文章加以集中，又将采访到的地方上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写成新闻报导，很快就改变了面貌，受到群众欢迎，发行量上升到二千多份。当时万县还有一个三青团办的《万州日报》，原来每天销售达三千份，这时被《川东日报》抵销，下降到一千多份。这政治上、经济上的打击，触怒了反动党团。同时，报社内部原来留下的成员李氏兄弟，既没有本事，又抽大烟，见这批人能力比他们强，怕挤掉饭碗，于是和反动派勾结，说刘立平与万宝仁这两个外地人来历不明，要调查他们的身分。经同志们商量，由陈德明资助路费，万宝仁乘船去了南京，刘立平则转移到鱼泉中学。不久，其它几位本地同志也呆不下去，先后转移到别地去了。

五、倒下，在黎明之前

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，正当立平与同志们积极准备迎接家乡解放的时候，不幸又一次被捕。据同狱的难友王泽如（解放后任成都十六中总务主任，已离休）、杨成全（乐山市中区人大副主任）、江维礼（井研农资公司退休干部）等同志介绍，立平在狱中经常与他们分析时局，漫谈人生观，指导没有经验的同志如何与敌人斗争，鼓励他们坚定胜利的信心。他希望先出狱的欧阳熹能通过其父与上层人物的关系，争取乐山和平解放。对先被逮捕在敌人威逼下供出了与立平的关系，因而使立平被捕的王兆贵，考虑到他年轻（当时只有十七岁），缺乏经验，没有计较个人恩怨，而是耐心教育他，指出他错误的严重性，帮助如何应付敌人的进一步审讯，使案情不扩大，保护尚未受牵连的同志。以后王兆贵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，没有再给敌人提供线索。解放后，他一直为刘立平的牺牲忏悔。

在狱中，立平还与难友们分析看守人员，对那些比较本份的，从形势政策方面开导，指出国民党大势已去，乐山解放指日可待，不要继续作恶，给自己留条后路；对那些坚持反动立场的，则提高警惕，不在他们面前流露思想感情。为了鼓舞难友的情绪，他们还低声唱国际歌和扭秧歌。在立平的团结帮助下，短短一个月的时间，原来互不相识的难友们已形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。他们在思想上互相帮助，生活上互相关心。有个青年在敌人审问时说：“我原来并不了解共产党，你们把我抓来后，我才认识了什么是共产党，共产党员是怎样的人。”立平牺牲后，狱中的同志们非常悲愤，他们将一页《圣经》贴在墙上，每天早晚以向耶稣祷告的名义悼念他。还秘密开会讨论“准备如何死”，表示要向立平那样英勇就义。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早晨，立平被敌人从监狱提出，送到伪专署。当时在专署旁边缫丝厂做工的女工们听见吼叫声，从墙头上看见敌人强迫他在伪造的“口供”上捺手印。他不听从，敌人把他按在地上，碰掉门牙，鲜血直流。接着便把他五花大绑，游街示众。立平沿途高呼“共产党万岁”的口号。大街两旁群众情绪激动，他们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，充满了对敌人的愤恨。敌人本来打算押到肖公咀才处决的，后因秩序混乱，怕发生意外，刑场临时变更，匆匆忙忙在新码头就将他枪杀了。

立平在黎明前的战斗中倒下了。千千万万烈士的鲜血换来了鲜艳的红旗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家乡乐山获得解放，人民到处传颂着他的事迹。即使他在十年浩劫中被诬为叛徒，但是他的高大形象始终在人民心中屹立着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党和政府拭去他身上的尘埃，恢复了他的光彩。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六日，中共乐山地委批示：承认和恢复刘立平同志的党籍，党龄从一九三八年秋算起。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八日，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刘立平为革命烈士。乐山市中区人民政府为刘立平

同志整修了墓地，树了墓碑，并于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五日上午在乐山城郊团山子举行了揭幕仪式。

立平的一生，是勤奋学习的一生，是追求真理的一生，是与敌人斗争的一生。他找到正确的道路后，就执着地走下去，无论组织的审查，监狱刑场的考验，都没有动摇他的意志。作为他的学生和同志，我将永远向他学习。

记刘立平二三事

赵乐群

新来的编辑主任

一九四五年的西昌，城市人口不足五万，却是西康省的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交通、文化、教育中心，仅新闻、广播机构就有八家。报纸中有一家《新康报》，是二十四军一百三十六师师长刘元瑄（现民革四川省政协副主席）出资创办，日出四开纸一张，发行量约三千多份（在当时西康各报中是最高的）。刘元瑄是廿四军中最年青的将领，思想倾向进步，对报纸的政治态度颇有影响。在总编辑许成章（峨眉人）主持下，先后延揽了二十多个共产党员、民盟盟员和进步人士担任编采工作。这批人后来又成为刘、许在成都创办《西方日报》的骨干。

一九四五年初，《新康报》编辑主任陈落（现在上海《辞海》编委）、编辑王石泉（解放后在《四川日报》）、帅雪樵（现四川省文化厅）先后去重庆，编辑部只剩下郭正坤（解放后在公安部门工作），人手缺乏。总编辑许成章各处物色，找民主人士推荐，终于聘来一位新编辑主任，这就是乐山人刘立平。

那时，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，容不得异己言行，《新康报》

成了蒋介石西昌行辕眼中钉，受到特务严密监视。报馆的人也养成了一种经常戒备的精神状态，对不知底细的同事老是时刻防范着，连同一战壕的战友也被猜疑。新来的刘立平也不例外。

我当时是采访部的记者，工作上直接受总编辑指挥，和刘立平没有什么业务联系。我和他虽然认识了，却很少交谈，彼此只是每餐同桌吃饭时闲聊几句。不过他给我的印象不错，没有编辑老爷架子，面色清瘦，一副营养不良的眼睛倒很有点灼人神采。说话和蔼，只是乡音颇重。

他担任编辑主任，不仅要编国内外新闻，还要编《康庄》副刊。来稿不中意，他就自己写，是个勤奋的新闻工作者。编辑部的人对他渐渐产生了好感，也逐渐和他亲近，编辑郭正坤和他更成了莫逆之交。

“专电”制造专家

国民党的新闻控制使各报都只有《中央社》独家电讯，而它的新闻信誉很低，读者很不满意。一些报纸便冲破阻扰，自己组织电讯，习称“本报专电”。《新康报》自己有一个《康藏通讯社》，在成都、重庆、昆明都有兼职记者，也常发来一些专电，但数量很少，一天最多不过几十百把字，有时一字都没有。在剧烈变化的局势中很不适应读者要求。

刘立平上任以后，专电骤然多起来了，天天都有，有时多至十几条。这些专电报导的都是《中央社》不发的或者与它的报导迥异的，其中既有时事真象、战局发展，还有敌后八路军活动战斗情况，以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。读者很欢迎，报纸销售不断增加。报馆上下也很兴奋。起初，我以为是驻外记者的功劳，说要为他们请功。刘立平却说算了算了，当记者不写消息算啥记者。后来，郭正坤悄悄告诉我说，那是刘立平坐在报馆里发的。原来，他们秘密收听延安广播或收到进步刊物以后，利用

其中材料改头换面编写的，而且改得天衣无缝。刘立平手法最高明，也写得最多。由于点子是他出的，我们都戏称他是专电制造专家。但制造专电的事，在报馆内还是保密的，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。

他的这一创举，报馆后来继续运用，而且启发了我。1947年我兼任《西方日报》驻重庆特派员后，运用重庆当时便利条件，依靠国内外进步报刊，也给报社“制造”了大量专电，也都得到读者欢迎。报社同事认为我有功，其实功应归刘立平一半，他是我的老师。

制造专电近于愚弄读者，现在看来不可取，但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旧中国，也是正直新闻记者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战斗手段。

巧取《新华日报》

《新康报》有一个专栏叫做《川讯》，是许成章创始，以辑录四川报纸要闻为主，不定期，主要读者是在西昌的四川人。后来许难于兼顾，叫我兼编。我着重摘录重庆报纸报导的政洽时事，特别是正在兴起的民主运动。刘立平对这项工作很关心，给我提了很多建议。他每天查阅交换报刊后，把可摘录的都用红笔划出交给我。由于读者欢迎，他和总编商定，把这个专栏转到要闻版，固定天天见报，字数也从三四百字增加到千把字。对我来说负担不轻，但有他和郭正坤支持，到也乐此不疲。有个会理读者和允恭写信给他，称赞《川讯》是“民主之宫”，从中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之光。他藉此对我进行一番鼓励。

当时，我摘编的报纸主要是《新华日报》，而这个报经常被西昌行辕邮检所扣留，即使报馆出面索讨也无济于事。没有这个报供稿，版面不免黯淡无光。刘立平有见于此，便给我出主意，叫我去邮局内部设法拿。我不敢。有一天晚饭后，他约我一道上街逛耍，走到顺城街邮政局时，营业室早已下班，但侧面大门还

开着。他便拉我进去，我犹豫，怕人家盘问惹出麻烦。他说别怕，有人问就说找人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相熟的人在内，但还是跟着他进去了。院子内静悄悄的，人都走光了。院子北面就是分拣房，栅子栏杆门锁着。到门前一看，只见屋角里乱七八糟堆着一堆报束，全是《新华日报》，原来是邮检所扣下后丢在那里还未销毁。我们真是如获至宝！趁院子无人，赶忙找树枝隔栅子把它拨出来，一连拨勾出十几束，我们把它分藏在内衣袋、裤兜里，也不敢多拿，怕露馅。藏好出门，在大门口就碰上一个邮局的人。他沉着地主动迎上去问：陈××住在那里？这陈某原是报馆所在地仓街的投递员。那位邮局的人不疑心，指点之后就进去了。我们急忙回报馆。路上我问他认识陈某？他只笑笑。其实他也不熟识。在那个年月看《新华日报》的人都被特务当作危险分子，专门去邮局偷《新华日报》，风险可想而知。这次收获不少，材料供我搞《川讯》供他编“专电”，接连运用了好几天。

博古表扬有他一份

昆明民主运动蓬勃发展起来，刘立平在报纸编辑工作中想方设法作了大量报道。有些材料来自西南联大他的朋友，我和他就曾去西街一个姓吴的家里取过一次。还有的是得自中华职教社西昌进修书店。这个书店的经理王梓赋、代剑萍夫妇和我们都很熟悉，两个都是老共产党员。他们经常把一些昆明出版的民主刊物尽先提供给刘立平。我们也常去书店搜寻其它可供利用的材料。

《新康报》的政治态度是显明的，支持团结抗战，反对分裂内战，支持民主进步，反对独裁专制。在民主高潮中连续发表支持学生行动的社论，和国民党办的西昌《宁远报》始终针锋相对，专揭国民党政府疮疤。其中有些言论文章和新闻报道就出自刘立平之手。后来国民党中央曾饬令西昌康省党部查究《新康报》编辑人员，诬它为“奸匪报纸”“共产党应声虫。”饬令被刘元

撞顶住。西昌行辕不肯善罢甘休，几次跃跃欲试，终因刘元瑄的保护（曾一度派兵驻馆守卫）不能下手。

由于《新康报》的一贯表现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博古于1946年初曾从重庆来信表扬。对报馆编采人员是莫大荣幸。这当中自然有刘立平一份功劳。但得信时他已离开报馆。

刘立平是1945年冬仓促离去的。因为他得到信息，行辕准备抓他。临行时总编辑许成章送了他一笔钱，他才有路费启行。他离西昌后和我没有通讯，也不知其去处。

难中相逢在重庆

1945年时，我原读西昌师范时的老师刘振美在重庆得艾芜、任钧等支持办了一个《华美书屋》，出版文学书刊，邀我去给他当助手。直到1946年3月，我才摆脱羁绊前往重庆。不想到达时书店已关闭，刘已去上海（后被捕，1949年牺牲于渣滓洞），我人地两生，盘川早已用尽，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。一天，我正脚踏上清寺街头，忽然碰到了刘立平，真象遇到了救星。他得知我的窘况后，便慨然伸手援助，把我收容到他的住处，为我解除了食宿大难题。

他来重庆已有一月多，工作也还无着，借住在下曾家岩嘉陵江畔《商务日报》编辑部一茅棚内。原来西昌《新康报》的陈落、王石泉、帅雪樵都在那里工作。他是凭他们的关系住进去的。我去后和他挤在一屋。他给我找来一副竹凉板作床。有了住处，跟着是吃饭问题，陈、王、帅等老同事对我们十分关照体谅，叫我们随他们去吃大锅饭（当时报馆都供职工伙食）。这种白食偶尔还可，久了大家都尴尬难处。刘立平和我又都面浅皮薄，于是决定忍饥挨饿挣持下去。他每天奋笔疾书，写些杂文稿给《新民报》、《大公报》、《民主报》等，得到稿费便拿来买大饼、烤红苕充饥。我当时情绪极为沮丧，怅望滔滔江流，几乎想